

试析蒙古语地名结构及其语义特征

贾晞儒*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 西宁 810007)

[内容提要]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各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 形成了独特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蒙古语地名正是反映了这个特点。从蒙古语地名的命名方式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中, 我们不但可以探索其语言特点, 而且更可以探索其历史及其民族心理特质。

[关键词] 蒙古语地名 结构特点 文化蕴含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13) 02-0076-06

地理名称不仅是地图制图学必须的条件, 而且它也有着重要的语言学意义和文化学意义, 因为凡是地名都是人们根据一定的语言规律, 组成一定的结构单位来做某个地理实体的名称的, 即地理称谓的“符号”。所以, 地名学也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我们如果进一步观察, 又会发现, 它也与一定社会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社会心理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而且一旦被社会所公认, 就成为代表某个地理实体的固定的“语言单位”而不可随意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 几乎所有的地名都包含着一定的文化意义, 具有人的主观情感的色彩, 其中有的就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忆, 也可能是当时人们的某种情感倾向的寄托。一般说来, 地理名称非常稳定, 保持久远, 不仅成为独特的历史文献, 而且也是语言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它既有历史学价值, 也具有语言学、文化学的意义。本文基于上述认识, 仅以青海蒙古语地名为个案, 就蒙古语地名结构和语义特点作一探析。

一、蒙古语地名的结构特点

作为地名, 不论是那个民族的, 都是以特定语言的词或词的组合来表示的, 都具有符号的性质, 有其共同的规律和形式。但是, 各种语言之间又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仅表现在语音和词语的组合规律等方面, 而且主要地表现在反映该民族的世界观的词语语义的差异上, 这种差异性又必然会反映出不同民族(或民族个体)的认知差异。不言而喻, 地名是由一定语言的词语构成的, 也必然会成为操该语言的人们认识自然地理实体特点的标志性符号。因此, 研究地名, 同样可以揭示一个民族

* [作者简介] 贾晞儒(1936—), 男(汉族),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 从事蒙古语言文化研究。

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特点及其民族心理特质。基于这个认识,本文拟以青海蒙古语地名为个案,对蒙古语地名的结构和语义特点作一些分析。

地名属于专有名词类,它是在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由普通名词形成的,标志着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所以说,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留下的“足迹”,又可以成为研究民族语言演变、发展历史规律的活材料。一般说来,当一个普通名词作为某个地理实体的代码,并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它就被个性化了,跟它所标记的那个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转化成为个别的概念。但是,作为语言的词,是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这就会出现组成地名中的某些词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而与地名的固有意义产生龃龉现象,例如,在都兰县境内一个地方叫“köšiyetü”(汉语写作“考肖图”)中的[k]辅音,在现代蒙古语里却读作[x],从舌面后送气清塞音,变成了舌面后的清擦音;又如,位于香加乡府东北约10公里处有一个地名叫“qurimtu”,意思是“举办宴会的地方”,然而,已经是名存实亡,难以找出它与所指称的地理实体的文化渊源了;其次,由于语言的不同,各个民族认识到的自然世界也就有所不同,于是就表现出命名方式的差异和反映在地名上文化观念的差异。蒙古语地名也是如此,它既有和其他民族语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结构形式,以及表现在地名的语义内涵上的民族差异性。现做如下分析:

(一)用复合名词形式作某个地理实体的名称

这是任何民族语言的地名所共同具有的普遍规则,但蒙古语在复合形式上却有自己的特点,扼其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通用名词+通用名词。前者是小语义场中的具体地理实体的通名,后者则是相对而言的大语义场中的通用名词。相当于荀子讲的“大共名”和“小共名”的相加形式。即用一个普通名词作某个具体地理实体的名字,但又无法与其他同样的地理实体区别开来,就将这个通名附加在它的上一层语义场中一个通名之前,作限定成分,这个限定成分就成了这个地理实体区别于其他同类地理实体的符号标志。这种命名方式,往往是在有定的大语义场内的比较中形成的,如果仅从这个名字的词义来看,对于本民族来说毫无疑问,但对于其他民族的人来说,可能难以起到区别同类事物的作用。例如,在青海省境内有一座山蒙古语称之为“dabavan avula”,其中,“dabavan”是在名词“dabav-a”(岭、山岭、关口、难关)词干上接缀形容词附加成分“-n”变成了形容词“dabavan”(山岭的、岭的、关口的、难关的),作通用名词“avula”(山)的修饰成分。在蒙古语里“dabav-a”作为一个独立使用的名词,是特指顶上有通行之道的山,其后又接缀一个通用名词“avula”(山),它就成为这个地理实体的区别特征而表明不同于其他的“山岭”。言外之意,它不同于一般的山,而是有通行之路的山。因为“dabav-a”(山岭、关口、难关)这样的地理实体是很多的,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就必须赋予它们不同的称名,而青海蒙古语却“独出心裁”地把通名当做另一个通名的限定成分组合在一起,标记一个有特征的山体而与其他一般的“山岭”区别了开来,与汉语相比较,就很有特色,汉语一般是在“岭”之前加缀形容词或者名词,组成复合结构来区别同类实体的。如“老虎岭”、“黄沙岭”、“老爷山”、“终南山”、“太白山”等,不能都叫同一个名字,所以,在汉语里,就叫作“大板山”(音译+意译“山”)。后缀一个通用名词“山”,使前者变成了这个“山”的特征(顶上有通行的路)的体现者。这就是无人不知的由西宁市到海北州门源县的必须跨越的一座大山。

(2)形容词+名词。这是所有语言的地名通用的一种结构形式,蒙古语地名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众所周知的“可可西里”就是蒙古语的“köke”(青色的、蓝色的)+“sili”(平伏的丘陵、后颈),全称义是“青色的丘陵平原”。但是,蒙古语和汉语不同的是,作为地名,形容词和名词组合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语义搭配的问题。在汉语里,表示动态的形容词,一般是与动词相结合的,也可以与部分名词相结合,如汉语的“慢走”、“快跑”等,也有与名词组合的,如“快道”、“慢道”、“快车”、“慢车”等,因为它们都是表示快速行驶的车道或车,与行为、动作的空间相联系,是一种缩略词。我们可以说“快行的道路”、“慢行的道路”;“快速行驶的车”、“慢速行驶的车”,很少与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名词相结合。但

是,蒙古语地名的搭配习惯却与此有些相悖的地方。蒙古语可以将表示动态的形容词与地理实体的通名“avula”(山)之类的词组合在一起来表示一个具体实体地名、山名等,如在青海省海西州,有一座山就叫“türgen avula”(快山),是一个复合结构,其中“türgen”(快的、急速的、性急的),是和人的行为、动作和性格相联系,但它却“一反常态”,与表示自然实体的“山”组合在一起作一座山的名字。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这座山有一条通往某地的捷径。

(二)名词+表数范畴的附加成分

这是蒙古语地名的一个显著特点。例如,青海省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叫“格尔木市”是蒙古语的音译,即“voolmud”,它的结构是:vool“河”+mud(数范畴),意思是“很多的河流”。“mud”是青海蒙古语方言中表示“多”数范畴的语法成分,现代蒙古语里则是“ud/üd”,它单独置于名词之后,不能像青海蒙古语那样直接后缀在名词词干上。汉语音译时把后面的“d”去掉了,主要是为了区别与格尔木市相距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个叫同样名字的地方,即“郭里木德”,是一个乡镇所在地。此地也是因细细溪流弥漫遍野,而命名的。

(三)合璧词组作地名

青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迁徙、消长、更迭十分频繁的地区,几乎曾经驻足于斯的古代民族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地名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已经消失,无法考证,有的融入于当代世居青海的各个民族的语言地名之中,很难确定它的语源。如现在的祁连县的“祁连”,有学者认为是吐谷浑语,但至今找不到充分的佐证;天峻县的“天峻”,有的学者认为是蒙古语[təŋgər](天)的汉语音义兼译词,表示海拔高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地名是多种民族语言合璧。例如:今乌兰县境的“巴音桑根”就是蒙藏语合璧地名,“巴音”是蒙古语的“bayan”,即“富裕”的意思。“桑根”是藏语,即“焚香山”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富裕的焚香山”,今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优干宁”也是蒙藏合璧的一个地名,“优干”是蒙古语,即“irgen”(汉族),“宁”是藏语,即“阳坡”,全称意是“汉族经商的地方”,现在是县委、县政府所在地。至于跟汉语合璧的地名则比比皆是,如“巴音河”、“甘子河”、“陶斯湖”、“巴颜喀拉山”、“索卜沟”、“哈拉直沟”等。

合璧地名反映了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各民族一定的文化心理的相通性和认知上的一致性,是我们研究民族关系和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二、蒙古语地名的语义特征

蒙古语地名几乎遍布青海全省,说明了蒙古族在历史上,曾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开发,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在蒙古语地名中,有许多都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其中有的还反映出蒙古族心理历程的时代特征,很值得我们去发掘、研究。根据我个人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一)蕴含着蒙古族人民美好的心理期盼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祈盼佛的保佑。在历史上,青海蒙古族人民曾经长期遭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的欺压,又生存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长期经受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的磨砺和考验,使他们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空幻的“神”、“佛”身上,起初,他们以萨满教为自己的精神崇拜,后来(约公元16世纪下半叶),蒙古汗王(俺答汗)与藏传佛教结盟,又把自己的美好期盼寄托于佛教而皈依于藏传佛教,于是,很多地名都与藏传佛教相联系。他们把祈求吉祥、幸福、和平和安宁的善良心理,赋予具体的大山、河谷等自然实体为“神灵”,作为自己顶礼膜拜的对象。例如乌兰县的“vanjuur-yin kötöl”(甘珠尔梁)、其中的“vanjuur”是指大藏经,“kötöl”是“山坡、山梁”的意思,全称义是“保存有“大藏经”的山梁”;“burqan bodi avula”(万佛山),其中的“burqan”是“佛”、“bodi”是“菩提、正觉”,是佛教用语,即

“觉悟的境界”、“avula”是“山”，全称义是“万佛所在之山”。在蒙古族人民看来，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佛的化身，都是要虔诚崇拜的“神灵”，敬山、敬水、敬万物，才能得到佛的保佑。

(2)反映求吉祥、求富裕的心理。在历史上，蒙古族人民经受过重重困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殷切地向往着吉祥、富裕的生活。尽管现实使他们的这种美好的希望屡遭破灭，但他们依然矢志不移，孜孜追求，而且把这种虔诚的心理期盼转化为地名，铭刻于心，以其教诲后代子孙为之前赴后继。所以这类地名在蒙古族聚居的地方随处都可以遇到，即使在曾经驻足过的地方，也同样留有这样的地名。例如：在今天的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巴燕镇就是蒙古族驻足过的地方留下的一个地名。“巴燕”是蒙古语“bayan”的音译，即“富裕”的意思。据历史记载1253年癸丑，忽必烈率军驻足六盘山度夏，秋七月奉命东征大理，曾在今化隆县黄河畔地区驻扎过，并在今西倾山河曲设立驿站和马场，战后，就有达吾尔部的一部分人留居下来，成为今天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人最早进入该地区的部落。^①而“巴燕”这一地名正是这段历史的记忆。又如，蒙古语“cavan”是“白色、纯洁”的意思，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形容词，但是，对于在历史上主要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蒙古族来说，却对它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心理期盼。他们把“白色”视为至高无上的圣洁的象征，所以，他们用这个形容词构成了一系列的地理名称，如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地区的“caan qada”（查干哈达），“qada”是一个通名，即“山峰”的意思，全称义是“白色的山峰”、格尔木地区的“cavan usu”（察汗乌苏），“usu”是“水”的意思，也泛指“江、河、泉、湖、海、自然村”和“井”。全称义就是“白色的水”。都兰地区的“cavan aman”（察汗毛），“aman”是个普通的名词，即“口、嘴”的意思，全称义是“白色的豁口”、“cavan namuy”（察汗那木格），“amuy”，是“沼泽、泥沼”的意思，全称义是“白色的沼泽地”，乌兰地区的“cavan navur”（白色的泉），“navur”是“湖、泊、池”的意思。全称义是“白色的泉”、“cavan yool”（察汗郭勒），“yool”是“河”的意思，全称义是“白色的河”，等等。这些地名都是在普通名词前面缀以“cavan”（白色）不但有了特指的意义，而且深深地烙下了蒙古族人民的尚白心理，使普通的自然地理实体，具有了神圣的象征意义。

（二）历史的记忆

在青海省境内的蒙古语地名中，很多都是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记录。成为人们理解和研究青海蒙古族历史的“活化石”。例如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的东沟乡的“洛少人”，原是在历史上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迁徙而来的蒙古人，当地人把这一部分蒙古人称为“洛少人”，于是这些人居住的地方也就叫“洛少”，成为这个地方的地名而沿用至今。“洛少”是蒙古语“alašan”的转音，其词首元音[a]脱落，成为[l]辅音起头的单音节词了。又如，在乌兰县有一个地方叫“柯柯”，是蒙古语的“köke”（青色、蓝色）的汉语音译。相传，原新疆蒙古卫拉特和硕特部固始汗和巴图尔珲台吉于公元1636年，率卫拉特联军进入青海境内，在此建旗时，派12名勇士（bavatur 巴图尔）来勘察，为建立“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因为他们的坐骑都是铁青色的骏马，为表彰、纪念他们的功绩，就将该地命名为“köke”（柯柯）。今都兰县的“香加”是蒙古语“šangna-”（动词，“赏赐”的意思），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民国初年，九世班禅却吉尼玛与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失和，于1923年由西藏来青海，经今海西州到兰州、西安，再转赴北京、南京等地。1932年，国民党政府封九世班禅为“西垂宣化使”，让其回青海暂住，待机返回西藏。九世班禅在塔尔寺和香日德停留，并在香日德设立行辕。他在香日德期间，甘、青两省的蒙古族、藏族王公、千户拨出一部分所属牧民作为班禅的属民，归班禅行辕管辖，后来这一部分牧民就形成了一个部落称为“香加旗”，其居住地就叫“香加”。意思是“享受赏赐的部落”。在今海北州有两座山，分别叫“大乌兰和硕”和“小乌兰和硕”，都是蒙古语音义兼译的地名。记录了公元1723年，罗卜藏丹津反清，满清政府发兵镇压，在这两座山上激战，血流满山，染红山顶的情景，故分别命名

①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13，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

为“yeke ulavan qošivū”(大乌兰和硕)和“baγ-a ulavan qošivū”(小乌兰和硕),其中“yeke”是“大”的意思。“baγ-a”是“小”的意思,“qošivū”是“鸟兽的嘴”,即“喙”,全称义分别是“大红嘴山”和“小红嘴山”

(三)反映民族崇尚心理和禁忌心理的变化

ulavan(红、红色)是一个中性的多义词,但是,蒙古族在古代对于红色有一种忌讳的心理,大多不会用于吉祥之类的事物,一般用来表示“赤裸裸”、“贪婪的”、“猖狂的”等意义。例如:

1. ulavan ɣaljavu;ulavan,即“红色”,ɣaljavu,即“疯的、疯狂的”,构成复合词表示凶猛的、桀骜的意思。

2. ulavan savulγ-a;avulγ-a本来就是“痢疾”的意思,前缀一个“ulavan”(红、红色)加重了语义。

3. ulavan javal;javal本来是指牲畜的毛是白花色的,两者构成复合词,表示残酷的场景,即“血淋淋的”。

我们在上面讲的“yeke/baγ-a ulavan qošivū”(大/小红嘴山)的“ulavan”(红色),也是如此,不表示吉祥的意思,而是表示“残酷的景象”。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种心理也在悄悄地变化着,“ulavan”和用 ulavan 组成的复合词大多表示正面的意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中,“红”有了特殊的革命意义,于是用 ulavan 构成了许多地名,表示“革命”、“正义”等积极的意义。例如,青海省乌兰县的“乌兰”就有着特殊的意义。1959年,经海西州人民政府并报省政府批准,在今西里沟地区首设县置,但考虑到 dulavan(音译为“都兰”,温暖的意思)一名已移到察苏地区,不能再用此名,因此,根据建政初期,都兰县公安局局长纪炳文等七位战士奉命赴茶卡地区执行任务,路经名叫“ulavan bulav”(红水泉)途中,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在英勇激战中,因寡不敌众而全部牺牲。从此这个地名就有了“革命”的纪念意义而扬名天下,加之,“ulavan”与“dulavan”的读音接近,十分和谐,因此,用“ulavan”(红、红色)作为析置的新县的名字,同时也成为纪念为新的地方革命政权的建立而牺牲的烈士们。“bulav”是“泉、泉源”的意思。因为这个泉所在地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山谷,因干旱缺水,野草枯焦,地皮干燥、外露,唯有这一眼小泉流淌着细流,所以用“ulavan bulav”(乌兰卜浪沟)来标记这个地方。可见,“ulavan”这个形容词本来不含有“革命”的积极的意义,而是时代所赋予给它的,同时也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心理变化。

还有一部分地名的用词,也有一定的特点,如不了解词的多义性和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仅仅依据词的词汇意义本身去研究某个地理实体称名的文化意义,就有可能造成误解。例如:“qar-a”(黑、黑色)是一个多义项的中性形容词,更多的是用来表示“空白”、“惊心”、“猛烈”、“恶毒”和“笨重”等意义的。但是,“bayan qar-a avula”(巴颜喀拉山)中的“qar-a”却是“雄伟”的意思,全称义是“富饶雄伟的山”,不再表示“黑、黑色”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研究蒙古语地名的时候,不但要参考一定的历史背景,而且必须结合蒙古族的文化心理和词语使用的习惯规则。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具备蒙古语言学的基本知识,而且要稔熟蒙古族认知事物的方式和心理特点。

三、余 论

从蒙古语地名中我们可以看到,地名不但是地理实体之间区别的符号,而且也反映地理实体的地貌、地质特征,同时,地名本身又往往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反映当地人们的社会心理特点和历史变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从地名中可以看到民族历史的变迁及其发展趋向和规律,又可以追溯人们的崇拜心理和理想目标的轨迹。青海蒙古语地名,除具有这些特点以外,还明显地表现出民族交替、融合的特点,反映了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展现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青海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蒙古语合璧地名就是佐证。同时,从青海蒙古语地名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

地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文化现象。所谓文化,学者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义,据笔者的统计,也有一百多种。在此,我们只从青海地名的实际出发,认为地名具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的人文“镜像”的作用。因为青海地名与青海各民族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活动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各民族的历史,就需要地名的帮助;人文学的研究就是着眼于各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的历史,而地名学又是人文学家最重要的知识源泉之一。青海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戎、氐、羌、吐蕃、吐谷浑、蒙古、回族、撒拉族,以及汉族等各民族文化交融之地,也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形成了十分繁复的文化景观,地名就是其中的一个特有的文化景观。这种景观“既包含历史的因素,也反映现实的影响。”^②是我们研究民族关系和民族关系史的重要“活化石”,也是我们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经济和人文诸环境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

地理名称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某些变化,诸如因民族更迭等原因而更名、读音转化,或者由于自然地理实体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使其原来的地貌特征消失,产生名不副实的现象,造成人们对原有地名意义的误解等。例如,在青海省海北州有一个地名,现在的人们都叫它“三塔拉”,其实,这个数词“三”的真正读音为[sain],是“美丽、美好”的意思,“塔拉”是蒙古语的“tal-a”,即“草原、平原”的意思,全称义是“美丽的草原”,“三”是对蒙古语“sain”的误读误写。根据史料记载,蒙古族早在公元1206年,最迟也在公元1227年进入青海。蒙古史学家萨囊彻辰说“岁次丙寅(即公元1206年)蒙古军会于柴达木疆域。”^③另一本史书也说:“太祖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破洮、河、西宁二州”^④。两者所说的时间尽管有些差异,但都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蒙古族进入青海高原的历史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特别是自公元1636年,和硕特部移居青海至今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不言而喻,“sain tal-a”这个蒙古语地名是与蒙古族进入青海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它告诉我们那时的“三塔拉”显然不是它本来所反映的这个地理实体的面貌。其间,由于自然环境的逐渐沙漠化,造成原来宜牧的“美丽草原”变成了荒漠,而地名又是相对稳定,不可随意改变的。由于在读音上“sain”与汉语的“三”是十分接近,而且也正好是三个平坦的荒漠地,因此就把“sain”误读为汉语的“三”,成了“三平原”的意思,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所以,地名的稳定性既可以成为人们研究“过去”的十分重要的依据,又因为发生了名不副实的变化,往往使人们难以认识到原来的地理面貌或命名的历史原因。可见,地名与地理实体本身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它要受到社会的、自然的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三塔拉”的“三”是汉语的数词,不论在书写形式上,还是在人们的口语里,使原来的“sain”语音结构发生了改变,因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本义。可见,人们对于地名的研究,也必须注意到地名读音的变化和差异。特别是在我国,民族语地名的书写形式都是用汉字或用汉语拼音符号标记的,很少注意分辨民族语地名的语音结构及其音值的差异,在汉语读音、书写形式等方面,都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本来的语音特点,由此而造成地名意义上的偏误,也就在所难免了。岂不知这种差异性又往往是深刻认识地名真正文化、历史内涵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重视民族语言地名的语音结构及其变化的研究。

[责任编辑:奥其]

① 《周易·贲》。

② 王恩涌等编著:《中国文化地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③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6。

④ 《元史·太祖本纪》。

information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On Hobuksar Tuerhute's tea donation to Tibet in Qing dynasty Guo Meilan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Oirad Mongolian nomadic in northwest reg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tribes: Junggar, Tuerhute, Dorbet, Heshuote. Because the tribes competed for the grassland, Tuerhute selected westward migration and settled in the volga river valle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uerhute Mongolian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a series of war under Wobaxi's leadership in Qianlong 51 years. The Qing government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and attended Tuerhute, and gave pension support to the people of back home through hardships, and specified the land for resettlement. Then Qing government arranged Tuerhute leader to tribute in Summer resort, and settled tea donation to Tibet. About Tuerhute's tea donation to Tibet, after Tuerhute return Qing government made arrangements for the first time. Just because the past master data is not much and the emphasis of the research are different, Tuerhute's tea donation to Tibet has been neglected until now. It led to the blank in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On the Manchu Edict that Kangxi gave Tuerhute Ayuqi khan Altanochir

In Kangxi 51 years, the Tulichen mission of Qing dynasty was sent on a mission to the kalmyk Mongol khanate according to imperial edict. In June Kangxi fifty-three years, the mission arrived in Manutuohai of the volga river basin, and issued imperial edict to Ayuqi khan. This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kalmyk Mongol khanate, even Qing dynasty and Russian relation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Manchu Edict's related history and characters, and had a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Manchu Edict's Latin transliteration, Latin transliteration, annotations,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e author adopted philology's research methods, and had textual research combining historical facts.

On Xin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from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e Gereletu

This paper analyzed Xin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policy of nat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Hejing county Xiemierqubademu village's villager Niman's petition to the government about improvement of the Mongolian women's clothing in 1941 in "the Archives of Modern Xinjiang Mongolian History".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he Biographies of Cebo Dao Er—ji Nuoyan" Kanaru, Cairendaoerji

The materials of Todo Mongolian "the the Biographies of Cebo Dao Er—ji Nuoyan" has some literature reflecting Cebo Dao Er—ji Nuoyan's stories. After it was found, the author preliminary explored the 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features and characters. The author also determined the book's literature value. This book provides the researchers with first-hand information text.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Black Lama Du Shanshan

Abstract: At the end of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Black Lama, Dambijantsan was such an active man i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 but disappeared after 1923. His story was recorded by numerous west China adventurers, which initiates many other researches on him.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se records in 1890s—1930s and reviews those researches on Dambijantsan.

On the Mongolian Place's Structures and Semantic Meanings Jia Xiru

Qinghai is a multi-ethnic populated place, ethnic culture collision, blend in here, formed the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You win to have me, I win to have you". Mongolian Place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From Mongolian Places' naming and its history, culture significance, We not only can explore its language features, and more can explore its history and national psychological traits.